

从敦煌吐鲁番文书看中人与地权交易契约关系

张可辉

内容提要：唐五代敦煌吐鲁番地权交易存在买卖、租佃、交换等不同的形式，无论哪种形式，依“官为政法，民从私契”的规则与观念而立契缔约成为必要程序之一。考察敦煌吐鲁番契约文书，自唐迄于宋初，文本中除了当事人双方外，另有保人、见人、知见人等不同称谓的第三方主体，即“中人”的签名画押。中人参与是立契缔约必不可少的环节，他们在地权契约中起着担保、见证、说合、调解等作用，本质上起着平衡社会关系的作用。这种平衡作用的实现，有赖于中人的身份与地位、权威与公信等因素，在一定的生活区域内能够为双方当事人所接受和认可，他们参与立契缔约，主要并不看重中人薪资，而更关注保持并提高其在一定区域内的美誉与认同，于是，中人角色的划分与中人秩序的形成就成为一种需要，责任、权益与秩序有其内在的一致性。

关键词：中人 地权交易 契约 敦煌文书 吐鲁番文书

中图分类号：D929.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743（2011）02—0063—10

敦煌吐鲁番地权交易契约文书大体分为买卖、租佃、交换、质典等不同形式，反映出地权交易形式的多样化。契约文书记载自唐迄于宋初，文本中除了当事人双方外，另有口承人或保人、同院或同坊、见人或知见、邻见或临坐等不同称谓的第三方主体的签名画押。一般地，凡在契约中署名画押的当事人双方以外的其他人，都可称为“中人”，在地权交易中起着担保、说合、调解等责任。中人具体称谓的变化与历史演进有关，但中人称谓不同，与其身份地位、责任义务或中人秩序等等因素是否存在对应关系？他们担保、说合、调解等等作用的实现有着怎样的要求？在此基础上，中人对于契约观念及文本的发展，乃至社会关系，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本文试对以上问题进行分析。

一、地权交易与立契有中

1. 地权交易形式

土地买卖是敦煌吐鲁番地区地权交易常见的也是最为重要的形式。唐代前期敦煌吐鲁番地区即存在土地买卖，中叶以后，均田制日益趋于破坏和崩溃，土地买卖比此前大为发展，有研究者指出，该地区的土地买卖包含不同用途的土地，如“农耕土地”、“园林土地”、“房宅基地”等。^①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于此有着真实生动的反映，如贞观十一年（637年）《高昌延寿十四

^① 赵云旗 《唐代敦煌吐鲁番地区土地买卖研究》，《敦煌研究》2000年第4期。

年康保谦买园券》;《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所载 P. 3331 《丙辰岁(896 或 956 年)宋欺忠卖舍契》;《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所载 S. 2385 《九世纪后期敦煌阴国政卖地契》;《敦煌契约文书辑校》所载 P. 2595 《唐乾符二年(875 年)慈惠乡陈都知卖地契》等等。

租佃是该地区地权交易的另一种常见形式。《吐鲁番出土文书》所载《唐贞观二十二年(648 年)索善奴婢田契》、《武周长安三年(703 年)西州高昌县严苟仁租葡萄园契》等契约是租佃人向田主租佃田地的凭证。《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所载 P. 3643 《唐咸通二年(861 年)敦煌齐像奴租地契》等契约也明确了田地租佃双方的权利与义务。

在敦煌吐鲁番地区,地权交易的另一种形式是交换。《吐鲁番出土文书》所载《唐天宝七载(748 年)杨雅俗与某寺互佃田地契》反应了将土地租佃权互换的事实。敦煌地区也有类似地权交易,时人称之为“博”、“易”或“迴换”。如《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所载 S. 3877V3 《唐天复二年壬戌岁(902 年)曹大行迴换屋舍地基契》、P. 2161 《丁卯年换舍契残片》等契约中即有“迴换”、“博换”字样。《敦煌契约文书辑校》所载《唐大中六年(852 年)僧张月光博地契》保存较为完整,地权交换信息更为详实。此外,地权交易也存在土地质典的形式,《敦煌宝藏》所载 S. 0466 《后周广顺三年(953 年)龙章祐、祐定兄弟出典土地契》、《吐鲁番出土文书》所载《唐贞观二十二年(648 年)洛州河南县查德琮典舍契》等即是这一方面地权交易的明证。

2. 地权交易律令

敦煌吐鲁番地区地权转让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契约文本来看,有的是因为缺少粮用,如《未年(827 年?)上部落百姓安环清卖地契》中的安环清是因为“突田债负,不办输纳”^①,《唐天复九年(909 年)己巳洪润乡百姓安力子卖地契》中的安力子是因为“阙少用度”^②,《后周广顺三年(953 年)龙章祐、祐定兄弟出典土地契》中的龙章祐、龙祐定兄弟是因为“家内窘阙,无物用度”^③;也有的是为了耕作方便,如《唐大中六年(852 年)僧张月光博地契》交换土地是为了“各取稳便”^④,《后周显德四年(957 年)吴盈顺卖田契》中的吴盈顺是因为“往来施工不便”^⑤,《唐乾符二年(875 年)慈惠乡陈都知卖地契》也是因为“不稳便”^⑥而将土地转让。宏观方面,其发生、发展则与均田制度本身及其破坏相关,地权交易律令也就相应地有所调整。唐前期均田制下的永业田包含着私有性质,据《旧唐书》载,武德七年(624 年)田令规定“世业之田,身死则承户者便授之。”^⑦开元二十五年(737 年),这一规定又进一步明确,《通典》即载曰“诸永业田皆传子孙,不在收授之限,即子孙犯除名者,所承之地亦不追。”^⑧从而留下了永业田地权转让的余地。关于口分田,《唐律疏议》规定,“不得私自鬻卖”,

① 沙知录校《敦煌契约文书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年,第 1 页。

② 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 2 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 年,第 8 页。

③ 黄永武主编《敦煌宝藏》(第 4 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1 年,第 19 页。

④ 沙知录校《敦煌契约文书辑校》,第 4 页。

⑤ 张传玺主编《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年,第 244 页。

⑥ 沙知录校《敦煌契约文书辑校》,第 11 页。

⑦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四八《食货志上》,中华书局,1975 年,第 2088 页。

⑧ (唐)杜佑《通典》卷二《食货二·田制下》,中华书局,1988 年,第 30 页。

但同时又规定“即应合卖者，不用此律”，即“永业田家贫卖供葬，及口分田卖充宅及碾础、邸店之类，狭乡乐迁就宽者，准令并许卖之。其赐田欲卖者，亦不在禁限。其五品以上若勋官，永业地亦并听卖。故云‘不用此律’。”^① 这些律令，为买卖口分田，也为买卖永业田、赐田提供了合法依据。及至后期与五代，均田制彻底崩溃，土地私有化加剧，地权交易比以前也就更为发展。胡如雷先生认为“均田制本身，通过反复还授，就成为土地私有化的一条自然通道，它本身就包含着促使自己走向破坏的内在因素。”^② 均田制及其破坏促进了地权交易的发生发展，《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所载 P. 4017《出卖口分地契残片》即是口分田转让例证之一。在敦煌吐鲁番地区，政府还对土地对换予以限制，诚如有学者指出的，土地拥有者之间可以任意对换土地是“晚唐五代土地私有化的另一标志”，但“土地的自由对换，并非是毫无节制地随便对换，其中主要的一个环节便是‘入官措案为定’，即必须经过官府的登记备案，以便有效地征纳赋税，否则也是不合法的。归义军政权所关注的并非是土地所有权的转移，而只是据地征税罢了，即谁耕种土地，谁就向政府缴纳赋税”^③。

唐五代时期，国家王朝对于永业田、口分田、赐田等土地权利的认同，是在均田制范畴内连带着律令强制的认同，是在向政府交租纳赋有所保障的基础上的认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认为，在东方传统社会，“国家既作为土地所有者，同时又作为主权者而同直接生产者相对立，那末，地租和赋税就会合为一体……在这里，主权就是在全国范围内集中的土地所有权。但因此那时也就没有私有土地的所有权，虽然存在着对土地的私人的和共同的占有权和使用权。”^④ 因此，交租纳赋相当于是使用权及占有权主体对终极所有权主体给予的收益补偿。唐五代时期，国家实际具有土地的终极所有权，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谓的“私有”，即“抛弃了共同体的一切外观并消除了国家对财产发展的任何影响的纯粹的私有制”^⑤，在这里不能一一对应，而是表现出一种“官私二元、以官为主、形态多样”^⑥的土地所有权状况和结构，可见，敦煌吐鲁番地区不同形式地权流转所谓的“私有权”不是纯粹的，与现代法学意义上的私有权范畴并不相同。

3. 地权交易程序

唐五代时期，政府对地权交易进行宏观调控，其程序可以分为交易前与交易中。

地权交易前，业主需要买卖申牒、先问亲邻。关于买卖申牒，《通典》载开元二十五年（737年）田令曰“凡卖买，皆须经所部官司申牒，年终彼此除附。若无文牒辄卖买，财没不追，地还本主。”^⑦《唐律疏议》也明确规定“依《令》：田无文牒，辄卖买者，财没不追。苗、子及买地之财，并入地主。”^⑧ 交易双方必须在交易前向官府申报，否则视为不合法，不受法律

①〔唐〕长孙无忌《唐律疏议》卷十二《户婚上》“卖口分田”条，中华书局，1983年，第242页。

② 胡如雷《隋唐五代社会经济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280页。

③ 刘进宝《晚唐五代土地私有化的另一标志——土地对换——以P. 3394号文书为主》，《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3期。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891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70页。

⑥ 刘玉峰《唐前期土地所有权状况探讨》，《文史哲》2005年第4期。

⑦ 《通典》卷二《食货二·田制下》，第31页。

⑧ 《唐律疏议》卷十三《户婚中》“妄认盗卖公私田”条，第246页。

保护,而政府也通过申牒制度保证了对田主的明确和赋税的征收。关于先问亲邻,《宋刑统》引“唐元和六年(811年)后来条理典卖物业敕文”曰“应典、卖、倚当物业,先问房亲;房亲不要,次问四邻;四邻不要,他人并得交易。房亲着价不尽,亦任就得价高处交易。如业主、牙人等欺罔邻、亲,契贴内虚抬价钱,及邻、亲妄有遮恡者,并据所欺钱数,与情状轻重,酌量科断。”^①地权交易中的先问亲邻,即先由亲邻认买或批退,有利于田地管理、耕作和使用效益的提高,对于土地兼并也具有一定抑制作用。

在地权交易中,立契缔约、官为公验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地权交易立契缔约在唐之前已经出现,《南史》卷五一《临川靖惠王宏传》即载曰“每以田舍邸店悬上文券,期讫便驱券主,夺其宅……帝后知,制悬券不得复驱夺,自此后贫庶不复失居业。”^②唐五代地权交易也必须签订契约,特别是在其后期,敦煌吐鲁番地区“官有政法,人从私契”的交易形式已为社会所公认,《未年(827年?)上部落百姓安环清卖地契》即载有“官有政法,人从私契。两共平章,书指为记”^③的说法。《唐天复二年壬戌岁(902年)曹大行迴换屋舍地基契》也有“官为[政]法,人从此契,用为后凭”^④的记载。在此过程中,尽管存在不公平的可能或事实,但在法律层面上,契约表现为平等关系,双方都有平等的责任与义务。官为公验即是立契缔约过后,由政府发给公验。《全唐文》载有天宝十一年(752年)《禁官夺百姓口分永业田诏》云“既缘先已用钱,审勘责其有契、验可凭,特宜官为出钱,还其买人。”^⑤这表明民间契约与政府公验都是地权交易的凭据,其目的当是为了明确产业与田税的过割。吐鲁番文书《唐开元二十二年(734年)杨景璿牒为父赤亭镇将杨嘉麟职田出租请给公验事》载曰,业主请求“各给公验,庶后免有交错”,而文本最后也有官府“依判”、“准状,符到奉行”的受理批示。^⑥

契约作为唐五代地权交易法律要件之一,从格式到内容逐渐成熟与固定,除了土地四至、出卖原因、土地价值、担保责任外,还需具备契约签订时间、当事人署名画押等事项。在《唐天复九年(909年)安力子卖地契》中,我们可以看到,业主安力子出卖土地,不仅与买主令狐进通签订了契约,而且文本还详细约定有卖地的原因、四至、价值、担保和责任等内容。^⑦在订立地权产易卖契约过程中,除了当事人双方外,还始终有着第三方主体即中人的参与,他们参与勘查田亩四至、议定土地价格、见证两相交付等等事项,也在契约上署名画押,在地权交易中起着说合、担保、调解等责任。

二、中人角色与中人秩序

唐五代时期,中人具体称谓具有多样性,称谓的不同源自角色的不同,从而也限制了责任与

① (宋) 窦仪等编纂; 薛梅卿点校 《宋刑统》卷一三《户婚律·典卖指当论竞物业》, 法律出版社, 1999年, 第232页。

② (唐) 李延寿 《南史》, 中华书局, 1975年, 第1278页。

③ 沙知录校 《敦煌契约文书辑校》, 第2页。

④ 唐耕耦, 陆宏基校 《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2辑), 第7页。

⑤ (清) 董诰等纂修 《全唐文》卷三三, 中华书局, 1983年, 第366页。

⑥ 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等编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9册), 文物出版社, 1990年, 第101页。

⑦ 唐耕耦, 陆宏基校 《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2辑), 第8页。

权益的不同。不同的称谓不仅是中人在形式上区别责任及权益范围的依据，而且在实践中也因此具有了实质上的意义。

1. 中人种类

吐蕃归义军时期的敦煌民间私契文书中有保人、见人、口承人、同便人、同取人等不同的角色，有研究分析，保人、口承人、同便人、同取人均为履约的担保人，年龄自8岁至60岁不等，身份复杂且多为被保人之亲属，反映了当时浓厚的家族观念、宗法思想；而契约中见人、知见人为契约的见证人，身份为节度幕府职官或村、里、乡官和百姓。^① 研究还指出，契约中用保人的时间较早，公元10世纪初“口承人”一词才开始大量使用，这说明了保人称谓的变化，也有研究针对敦煌契约文书中的“证人”、“保人”流变进行了详细考释并指出，隋唐五代时期敦煌契约文书中担保义务履行者的称谓有着保人、口承、保见、保知、见人、知见人的流变过程。^② 这里的“口承人”多为契约当事人之亲属，见证契约的缔结，保证契约的履行，类同于保人；见人、知见、保见则是立契缔约的见证。保人、见人、口承人、同便人、同取人、保见、保知等等都属于契约文书中的第三方主体，归属于中人，这在敦煌吐鲁番地权交易契约中也同样存在，如《未年（827年？）上部落百姓安环清场卖地契》中的“见人张良友”^③、《唐大中六年（852年）僧张月光博地契》中的“保人男坚坚”、“保人男手坚”^④、《唐天复九年（909年）安力子卖地契》中的“口承人男揭桥兄弟”^⑤、《后周广顺三年（953年）龙章祐、祐定兄弟出典土地契》中的“知见人法律福海”^⑥等等。

当然，敦煌吐鲁番地权交易契约中的中人角色也不止于此。S. 1285《后唐清泰三年（936年）杨忽律哺卖宅舍地基契》，在“见人”之前，有“同院人邓坡山”、“同院人薛安昇”的署押，“见人”之后，又有“邻见人高什德”、“邻见人张威贤”^⑦的签名。与同院人相类，《唐贞观二十二年（648年）洛州河南县查德琮典舍契》中，也有着“同坊人成敬嗣”^⑧的记载。券是契约的不同表达形式，贞观十一年（637年）《高昌延寿十四年康保谦买园券》，又有“时见唐□叔、临坐□帐姚”^⑨的描述。时见与保见、知见一样，是不同时期对见人的不同称谓，而邻见、临坐则应该是陪同知见。S. 3257《甲午年（934年）二月十九日索义成分付与兄怀义佃种凭》中，又有“见人书手判官张盈□”^⑩的签押，书手即为契约书写之人，所承担责任比起专职见人当为减少。

2. 同姓中人

在契约中人里，屡有与交易之人同姓者参与进来，这是值得关注的现象。

先来说说同姓保人。保人多由被保人的父母、子女、兄弟、妻、侄、姐妹等人承担，如

① 杨惠玲 《敦煌契约文书中的保人、见人、口承人、同便人、同取人》，《敦煌研究》2002年第6期。

② 敏春芳 《敦煌契约文书中的“证人”、“保人”流变考释》，《敦煌学辑刊》2004年第2期。

③ 沙知录校 《敦煌契约文书辑校》，第2页。

④ 沙知录校 《敦煌契约文书辑校》，第5页。

⑤ 唐耕耦，陆宏基校 《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2辑），第8页。

⑥ 黄永武主编 《敦煌宝藏》（第4册），第19页。

⑦ 唐耕耦，陆宏基校 《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2辑），第9页。

⑧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4册），第270页。

⑨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4册），第38页。

⑩ 唐耕耦，陆宏基校 《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2辑），第29页。

《末年(827年?)上部落百姓安环清卖地契》中有“师叔正灯、母安年五十二、姊夫安恒子”的记载,^①《唐大中六年(852年)僧张月光博地契》中有“保人男坚坚、保人男手坚、保人弟张日兴、男儒奴、姪力力”的记载等等。^②这一方面反映了家族共财的事实,家族中的个人对土地享有的仅是管业权,契约一方家庭及其成员对另一方也因此共同承担着某种法律责任,主要包括权利瑕疵担保责任、质量瑕疵担保责任等。《唐律疏议》规定“负债违契一匹以上,违二十日笞二十,二十日加一等,罪止杖六十。”^③民间私契参照法律规定施行,《唐大中六年(852年)僧张月光博地契》中即有“如先悔者,罚麦贰拾驮入军粮,仍决丈杖卅”的约定,同时,契约还约定,“如身东西不在,一仰口承人知当。”^④P.2858V《酉年(829年?)二月十二日索海朝租地契租地贴》中也有“身或东西不在,仰保填还”^⑤的约定。地权交易契约中家庭成员作保,也就使得法律责任具有了有效的保证。

再来谈谈同姓见人。见人身份相对复杂,百姓、僧尼、官吏、亲邻都可以知见,允许同姓的参与,但相对保人多注重与契约中业主的亲疏关系而言,见人更被看重的是其身份、地位、威望、公信力。同姓保人义务重在连带责任,而同姓见人义务重在说合调解。如《甲午年(934年)二月十九日索义成分付与兄怀义佃种凭》中,第一见人为“索流住”,即为业主索义成、佃种人索怀义、索富子的同姓族人。^⑥见人选择同姓族人,一方面是由于其纯粹自身的影响力,另一方面这种影响力也将因受到同一宗族中礼法关系的保护而变得更为强大,他们介入地权交易和契约签订,运用其社会关系与公信力来实现对当事人的监督、说合、调解,通过平衡双方利益关系来保障契约的有效性和交易的顺利进行。此外,唐五代社会,“官为政法,民为私契”规则之下,国家不干预私人契约,但有时又规定“经恩不偿”,既遇有恩赦可以免除法律责任,而敦煌吐鲁番地权交易契约对此是如何应对的呢?契约当事人为了保护自己的权益,在契约中每每订立排除国家赦力的条款,如《唐天复九年己巳(909年)安力子卖地契》所载“或有恩赦流行,亦不在论理之限”^⑦,《后周显德四年(957年)敦煌吴盈顺卖地契》所载“中间或有恩赦流行,亦不在论理之限”^⑧,《唐天复二年(902年)曹大行迴换屋舍地基契》所载“或有天恩赦流行,不在论理之限”^⑨等等即是这一事实的反映。有研究指出,这与归义军政权实际掌握这一地区有关,唐政府对该地区并无影响力,^⑩但这一独立于政府或法律规定之外的私权的有效性,如果离开了具有较强公信力的见人的知见,则无疑也是难以想象的。

3. 中人秩序

在同一个契约中,中人之间的角色不能相互取代,各自有着明确而不同的责任分工,但各个

① 沙知录校《敦煌契约文书辑校》,第2页。

② 沙知录校《敦煌契约文书辑校》,第5页。

③ 《唐律疏议》卷二十六《杂律上》“负债违契不偿”条,第485页。

④ 沙知录校《敦煌契约文书辑校》,第4页。

⑤ 唐耕耦,陆宏基校《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2辑),第23页。

⑥ 唐耕耦,陆宏基校《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2辑),第29页。

⑦ 唐耕耦,陆宏基校《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2辑),第8页。

⑧ 张传玺主编《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第244页。

⑨ 唐耕耦,陆宏基校《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2辑),第7页。

⑩ 霍存福,李声炜,罗海山《唐五代敦煌、吐鲁番买卖契约的法律与经济分析》,《法制与社会发展》1999年第6期。

中人角色在整体上有其内在的一致性，即有着一种习惯而井然的秩序，这于他们在契约中签押顺序有一定程度的表现。《唐大中六年（852年）僧张月光博地契》载曰：^①

1. [宜][秋][平]都南枝渠上界舍地壹畦壹亩，并墙及井水，门前
2. [道][张][月][光]张日兴两家合同共出入，至大道东至张日兴舍半分，西至僧张法原园及智通园道，南至
3. 张法原及东道并南墙，北至张日兴园园道。智通舍东开。又园地叁畦共肆亩。东至张日兴园，西至张达子道，南至张法原园及子渠，并智通园道法原园
- ……
18. ……保人男坚坚（手印）、保人男手坚（手印）、保人弟张日兴（藏文押）
19. 男儒奴（手印） 姪力力 见人僧张法原（签字） 见人于佛奴
20. 见人张达子 见人王和子 见人马宜奴
21. 见人杨千荣 见人僧善惠

从契约文本来看，保人因为承担着连带责任，而被置于重要位置，而见人是缔约时的见证人，履约的监督人，纠纷发生时的调解人，所以置于保人之后。《酉年（829年？）二月十二日索海朝租地帖》的中人签押也显示了这一特征：^②

6. ……见人及保弟晟子（押）
7. 见人及保兄海奴
8. 见人？氏
9. 见人
10. 见人
11. 见人

虽然见人承担监督、说合、调解等责任，但见人往往并不是由一人承担，多人知见一方面增强了见证的力度与公开度，另一方面也分解了个人知见的责任与权益。从《唐大中六年（852年）僧张月光博地契》可以看出，该契约缔结过程中，见人多达7人，但他们有先有后，其地位与责任也因此不同。张月光“南枝渠上界舍地”共壹畦壹亩，门前道“西至僧张法原园及智通园道，南至张法原及东道并南墙”，又有“园地”共叁畦肆亩，“西至张达子道，南至张法原园及子渠”，张法原、张达子也因此被当事人选择为见人或是他们自觉知见，而被排在其他见人之前，显示了他们知见的更为重要意义或是责任尽先意义。作为知见，除了土地四邻更为重要外，血缘上的联系也同样被看重，有着先行的责任，《后周广顺三年（953年）龙章祐、祐定兄弟出典土地契》或可说明，契约载曰：^③

14. 知见父押衙罗安进（押）
15. 知见人法律福海（知）

而对于陪同知见者等次要见证人来说，其责任较见人为轻，因此其排序也就更为靠后，贞观十一年（637年）《高昌延寿十四年康保谦买园券》载曰：^④

10. _____私要，行二主，各自署名为

① 沙知录校《敦煌契约文书辑校》，第4~5页。

② 唐耕耦，陆宏基校《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2辑），第23页。

③ 黄永武主编《敦煌宝藏》（第4册），第19页。

④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4册），第38页。

11. □□ 时见唐□叔

12. 临坐□怅姚

对于保人来说,排序有先有后,则意味着承担的连带责任也理应有重有轻。对于见人来说,参与契约一方面是民间习惯下滋生的义务感使然,另一方面,也是利益的驱动使然,这不仅包括物质的,也包括精神的利益,而犹以精神利益为要,李祝环先生即认为“非职业性的中证人参加契约的成立,其目的并不完全是为了得到酬礼,而在习惯中,可能更为看重的是对自我身份及信誉的肯定”^①。参与契约的见人数量多,固然使得个体见人承担的责任与获得的权益同步减少,但有秩序有标准的排序显示了与责任、权益的相适应,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人之间的角色冲突。见人的明确排序意味着见人责任、利益分配的明确,避免了利益的混乱与见人的内讧,从而保证了见人的公信力,保障了民间地权交易的正常进行。

三、民从私契与中人影响

1. 契约观念

如果把地权交易契约看作是地权流转时以当事人为中心的某种社会关系网络,从观念层面考虑,则“官为政法,民从私契”不仅可以理解为官府官员的契约观念,也可理解为契约当事人、参与人的契约观念,这一观念的形成则又是以中人的保障力、公信力等社会影响力为基础的:一方面,中人对地权交易当事人契约观念的影响。在地权交易过程中,立契缔约是一种必要程序,但也是一种心理认同,这从诸多契尾的说明可能看得出来,如《唐天复九年(909年)安力子卖地契》“恐人无信,故立私契,用为后验”^②的记载《九世纪后期敦煌阴国政卖地契》中也有“恐人无信,两共对面平章,故立私契,用[为后][凭]”^③的说明。而这种心理认同则源自交易双方对中人这一主体的心理认同,形成一种立契有中的观念,因而每一份契约都有中人的被动或主动参与。另一方面,如果交易纠纷将官府卷入到契约关系中来,那么官府也就成为契约关系主体之一。“民从私契”对于官府来说,与其说是官方的规定,倒不如说是官方对民间私契观念的认同。在唐五代地方官员的执政观念中,官府应该关注的重点是收租征赋、戡乱靖安,在此基础上也就接受了“民从私契”的观念,遇有相关纠纷则倾向于委中处理。分析敦煌吐鲁番文书中的有关状牒,则这种看法是不难找到佐证的。《开元西州都督府处分阿梁诉卜安宝违契事案卷断片》载:^④

府司:阿梁前件荀,为男先安西镇,家无手力,去春租
与彼城人卜安宝佃,准契合依时覆盖如法。其人至今
不共覆盖,今见寒冻。妇人既被下脱,情将不伏,请乞商
量处分。谨辞。
付职□□勒藏

① 李祝环《中国传统民事契约成立的要件》,《政法论坛》1997年第6期。

② 唐耕耦,陆宏基校《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2辑),第8页。

③ 张传玺主编《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第229页。

④ 刘俊文《敦煌吐鲁番唐代法制文书考释》,中华书局,1989年,第562~563页。

盖，勿□重□。

诸如小事，便即

与夺讫申。济

示

十三日

状牒中阿梁上诉葡萄园租佃人卜安宝未依约及时覆盖葡萄，以至葡萄因天寒而受冻成损，名为济的官员以契约约定为依据，判决卜安宝须“覆盖如法”，中人介入下的契约被认定为一种合法、正当、可靠表达。但官员济同时又认为，此事为“小事”，“便即与夺讫申”，即不必成讼。那么谁来定夺处理呢？是济的下属吗？从状牒文中所谓“请乞商量处分”来看，当是希望由当事人自行处理，而当事人处理此事，则必然要请当初立契缔约的中人来“商量”了。通过该案我们看到，政府以认同而不是干预民间私契为上，注重调解功用的发挥。

造成民间与官方的这种契约观念的诱因之一，还是在于中人基于保障力、公信力的社会影响的存在。而民间、官主对于契约的看重，或者说对于中人的看重，则又反过来对中人形成一种约束，造成一种影响，契约“一仰口承人知当”、“仰保填还”的责任也使得中人受到了物质上的约束，如果中人处理契约关系有失允当，则其必然负有连带责任或是名誉受到威胁，而在传统族人聚居的熟人社会关系中，名誉扫地甚至比连带责任更令人心生畏惧。在中人那里，他们往往会自觉而尽力地对当事人双方进行说合、调解，避免双方矛盾的激化，维持双方关系的和谐，并为自己赢得能力认可和良好声誉。

2. 契约文本

中人对于契约文本的影响，主要可以从契约形式与内容两方面来考察：

第一，中人对契约形式的影响。从契约形式上看，地权交易是当事人之间的事，且多半是业主、保人对受方提供的责任保证，但这并不能否定地权交易的公平，更不能否定契约本身的公平。在唐五代，无论是官府还是民间，“官为政法，民从私契”的地权交易规则与观念，是对契约关系有效性的有力保证，“民从私契”着重的是对契的效力的肯定，而不是对契约缺省或缺陷的否定，因此，无论是契约当事人还是契约参与者，并不会因为契约形式上的缺省或缺陷而否定契约的效力。契约的这一效力实现，则赖于外在的、具有公信而权威的第三方主体——见人的介入，在实际效果上，中人中的见人为地权交易双方都提供了担保。

第二，中人对契约内容的影响。唐五代地权交易契约在中人介入下呈现出不同于现代契约的内容规定，一般地，一份完整的地权交易契约的正文内容主要包括：地权交易原因、土地四至、价值约定、担保责任等，总之，契约绝不会避免细节与琐屑，这样自然也有益于契约效力的加强。对契约细节的关注，是契约效力的需要，也是中人责任与公正的需要，是中人名誉与权益的需要，只有不避细节，才能在说合、调解时有据可凭，有理可申。于是，中人往往会在立契缔约的过程中，不辞辛苦地从事勘查田亩四至、议定土地价值、见证两相交付等等事宜。

3. 社会关系

中人对地权交易的社会关系的影响也同样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即心理的与现实的：一方面，地权交易中，“民从私契”与“立契有中”形成了一种观念与传统，于是，中人参与立契缔约自然而然地对交易双方形成一种心理影响。中人的公信力使得中人参与议定的土地价格、勘查的田亩面积被当事人在心理上认为是可靠的，交易双方在中人的参与下，实现两相交付，并力

求避免双方矛盾的激化。这种公信力也将形成对当事人的心理约束,如果当事人一方不能切实发行契约,不仅将受到物质上的惩罚,而且“熟人”社会的人们也会因信任中人转而对违约人进行非议,在此基础上,当事人双方以自觉履行契约责任与义务也就逐渐演变成为一种心理需要。另一方面,中人参与立契缔约,对地权交易双方的事实了解准确,从而也就为处理契约纠纷提供了可靠依据,中人虽然只是说合、见证及调解,但这些作用的发挥,实际上因为其公信力、权威性而形成了对契约双方现实的有力的约束。举例来说,唐五代时期,如前所述,地权交易在立契缔约过后,还需要政府发给公验,以便明确产业与田税的过割,但地权流转与田税过割存在一个时间差,容易影响契约关系的稳定。此时,当事人之间寻求关系平衡的支点就是中人,中人利用自身的权威进行说合、调解,从而也就促使纠纷得以解决。

唐五代敦煌吐鲁番地权交易过程中,存在买卖、租佃、交换等不同的形式,无论哪种形式,依“官为政法,民从私契”的规则与观念而立契缔约成为必要程序之一。而在立契缔约过程中,中人参与则又是必不可少的环节。中人在地权契约中最明显的作用首先是担保作用,负有连带责任;其次是参加并见证契约签订的全过程,通过勘查四至、议定价值、监督交割等事宜,使得契约有了公开与公平的成份;再次是契约签订之后的说合、调解作用,当契约关系受到损害时,中人也起到调解当事人的争执与冲突的作用。中人的种种作用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关系平衡的作用。在地权交易契约的缔结过程中,双方当事人的经济实况、社会地位乃至长幼辈份都可能存在不对等的情况,但在民事契约关系中则必须受到权利与义务相对平等的制约,于是中人就成为一个支点,促使契约双方处于一种相对平衡的状态和契约关系的建立。诚如谢和耐先生所论述的,“各方的不平等关系无疑解释了中人在中国交易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他的职责是缓和要求者和被求者之间不可避免的紧张状态。”^①

这种平衡作用的实现,有赖于中人的身份与地位、权威与公信等因素,在一定的生活区域内能够为双方当事人所接受和认可。由于传统的地缘和血缘关系的影响,有威望的同姓中人又更为契约当事人所乐于接受,同姓中人也因地缘与血缘关系的影响而又加强了自身的影响力。官为政法、民从私契、身份地位、地缘关系等等诸多因素在人们的观念与习惯中不断融合、强化,于是,中人参与立契缔约就形成了地权交易当事人的观念影响与现实约束,也影响了契约的形式、内容,中人在官府那里逐渐成为契约正当、合法的证明,在民间则成为保障契约实现的象征。这种精神上的鼓励或者说是约束,使得中人在参与立契缔约时,主要并不看重中人薪资,而更关注保持并提高其在一定区域内的美誉与认同。当这种观念内化为中人的自觉选择时,中人角色的划分与中人秩序的形成就成为一种需要而不是内讧,责任、权益与秩序也就显示了它们内在的一致性。

(作者单位: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

责任编辑: 陈霞

责任校对: 王文洲

^① 谢和耐 《敦煌卖契与专卖制度》,载谢和耐、苏远鸣等编 《法国学者敦煌学论文选萃》,中华书局,1993年,第19页。